

# 中華文化在澳門的傳承和發展

吳志良\*

今年7月上旬，我參加文化部中華文化聯誼會組織的一個文化考察團，沿著“絲綢之路”到了敦煌。行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更為中華文化百折不撓的生存能力和巨大無比的包容開放精神所震撼和感動。在“絲綢之路”，特別是在敦煌，我看到了中華文明在21世紀世界舞臺上再放異彩的曙光。

如果說敦煌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彙融合的結晶，她代表着中國文明的對外開放性格和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那麼，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鎮，就是敦煌文化精神在近代中國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在澳門，我們不僅看到中華文化不屈不撓的頑強生命力，還找到了傳統與現代的有機契合點；在澳門，我們不僅看到中華文化的持續對外開放，還找到了中西文化交彙融合的可行路徑。在澳門，中華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和發展。

## 一

自古以來澳門就是中國的領土。遠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便已經在澳門地區活動。南宋時期，開始有比較多的中原人士進入澳門地區。明代中葉開埠以後，大量的東南亞和葡萄牙商人前來貿易，澳門迅速發展成為南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城市，既是古老中華帝國向外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是西方進入中華大地的一座橋梁，在中外經貿、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談論澳門，還得從明朝說起。

---

\* 澳門史學者。

錢穆先生說，“明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同時也是世界近代史的開始”<sup>1</sup>。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明代也是極其重要的發展和轉折時期。鄭和下西洋、貫通東西半球海上航道的開通、葡萄牙人東來並據居澳門，都發生在這個朝代。而葡萄牙人1553年“立埠於澳門，實為泰西通市之始”<sup>2</sup>。如果接受錢穆先生的觀點，中國近代史始於16世紀，那麼，澳門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與西方文化交往最密切、最持久、最全面的一個港口城市。澳門作為第一塊被西方人佔領居住的中國土地以及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商貿港口，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場所，身臨其境且榮辱與共地見證了其間的高低起伏和得失成敗。在相當程度上，澳門歷史亦反映了近500年中國與西方交往角力的全過程，從側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文明交鋒撞擊的輪廓。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澳門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案例。數百年來，澳門一直是西學東漸、中學西傳舉足輕重的通道——數學、天文曆學、醫學、物理學、地理學以及西洋美術和音樂通過澳門傳入內地，而四書五經以及中國宋儒理學也通過經澳門進入內地的傳教士傳到歐洲，從而大大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同時，正是東西文化對話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塑造出澳門自身特有的“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形成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群族和諧共進的社會環境。澳門在中西文化對話中衝突、調適、共存、融合的演變過程及其積澱，是對人類文明發展誠為可貴的經驗，值得作出深入探討，並從中尋找歷史啟示和理論意義。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在中西文化四個多世紀的交往過程中，“有交流，有匯流，有融合，有分解，有鬥爭，有抗拒，有接受，有拒絕。”<sup>3</sup>但非常引人深思的是，中葡在澳門的交往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性，基本上在不捨棄自身傳統、不失去自我意識的前提下，努力地試圖瞭解、認識、尊重對方，盡可能自我調適、避免衝突，從

1.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02頁。

2.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趙春晨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61頁。

3. 季羨林〈對於文化交流的一點看法〉，載季羨林、張光璘主編《東西文化議論集》，上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第2頁。

而形成澳門多元開放、寬宏包容、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文化品格和社會特質。這既是澳門在數世紀中外文化對話中的最大特性和最具意義的內涵，也是中華文化傳統在澳門一脈相承的最佳體現和弘揚光大的良好基礎及有利條件。

## 二

眾所周知，明朝中國對外政治、外交、貿易關係的主要形式為朝貢制度，鄭和七下西洋“揚威異域，示中國之富強”，便是為了鞏固和發展此一制度。1511年，葡萄牙人攻佔明朝藩屬國滿刺加，嚴重衝擊了中國的朝貢體系及其在印度洋和南洋地區的領導地位，徹底打破了此一地區的地緣政治平衡，標誌著西風壓倒東風之勢初成。明中葉後，中華帝國因應國內、外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化多次實行海禁政策，拒絕外商入市，葡萄牙人1513年抵達珠江口後，乘兩廣政府執行海禁政策不力之機試圖有所突破，與華建立商貿關係，但因為對中國形勢的認識有限而功敗垂成。此一教訓，令葡萄牙人在其後40年在浙、閩沿海“亦盜亦商”的活動中，更加注意加強對中國風俗民情和法律制度的瞭解，特別在寧波雙嶼遭到朱紉重擊的慘痛教訓後，其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從而逐漸改變了中國觀<sup>4</sup>，認識到明朝中國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必須遵守明朝的法律禮儀，必須學會跟明朝官員打交道，才有可能進入中國。換言之，葡萄牙人入據澳門<sup>5</sup>之時，已經有了相當的中國經驗，對中國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瞭解。否則，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裏，他們是難以長期立足的。

明廷在西方勢力抵達國門又無法將其徹底驅於門外之時開埠澳門安頓葡萄牙人，並非偶然，也不隨意，既有皇帝的利益（尋找龍涎香），又有國家利益（引進火炮鞏固國防、以夷制夷、減少軍事支出），也有兩廣地方利益（增加稅收、加強海防）。雖然這是一個不得已、被

---

4. 詳見吳志良〈16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49-170頁。

5. 其過程可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32-48頁。

動的折衷方案，但朝廷運籌帷幄，掌控着整個過程。澳門與大陸相連，離商貿重地廣州不遠，方便往來貿易，且地理位置易於設關防守。若葡萄牙人有不軌圖謀，封閉關閘、切斷供應即可，防範起來十分方便、經濟且有效，勝過千軍萬馬。

事實上，澳門開埠之後，明朝以降，中國政府除開緊緊抓住主權和治權進行宏觀掌控，也甚少插手澳葡內部事務，任其繁衍生息，並充份理解和關照他們與母國葡萄牙的血緣和文化聯繫。只有在葡萄牙人自覺不自覺侵犯中國主權或治權以及發生重大華洋糾紛時，兩廣地方官員才介入干預。

澳門開埠的此一特殊歷史背景，令葡萄牙人深明對天朝的致命依賴性。長期以來，他們也一直奉行雙重效忠的原則，一方面依葡萄牙法律風俗實行一定程度的內部自治；另一方面，不僅遵守天朝的法律、服從中國官員的管理，還充份尊重中華文化傳統和風俗，與華人和平共處，甚至通婚生子。很多時候，他們還以天朝“子民”自稱，依附並效忠朝廷，一體納糧，並在有需要時應召服役，如多次助明抗清。

當然，在葡萄牙人最初居澳300年的歷史中，並非毫無磨擦、矛盾和衝突，但在每次衝突中，葡萄牙人最終都能審時度勢，知所行止，不致於令衝突上升至武力交鋒。這種華洋共處分治的情況，大致維持到鴉片戰爭之後。

可以說，澳門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一個特區，既在中華帝國政治、行政和法律秩序之內，又因為葡萄牙人入居而成為享有一定內部管理自治權的特殊城市，與明、清中央政府的關係十分獨特。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推行殖民政策，在殖民狂熱中，澳葡當局多次侵犯中國主權，破壞中華文化傳統，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然而，這不僅沒有嚇倒居澳華人，相反，更加激發了他們的民族精神，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認同，而澳葡當局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過這些衝突，葡萄牙人即使通過1887年簽訂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得到“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在維護華人文化傳統、處理居澳華人有關事務時也小心謹慎，沒有強行將他們的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加諸於華

人，相反，還依照兩廣民風民俗在1909年頒佈《華人風俗習慣法典》，將天主教義不容的一夫多妻制合法化，而財產繼承權也只歸男嗣。

從政治法律意義上，嚴格地說，清廷只是喪失了治權而始終未失去主權，中葡在澳門的力量此消彼長，基本上能夠保持著某種平衡，澳門一直以來的特殊身份與地位並未產生本質上的變化。換言之，澳門既在中華體制之內，又在體制之外，只是有時與體制的關係密切些，有時鬆散些，但跟母體的血脈聯繫無時不在，居澳華人在文化上與祖國的聯繫從未割斷。即使在殖民統治期間，居澳華人也沒有片刻忘記家國情懷，沒有動搖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以其對中華文化強烈的歸屬感和向心力，恪守自己的文化傳統，薪火相傳，使得我們的傳統文化在複雜的外來文化洗禮中仍能保持主體的獨立性和完整的自主性。

正是因為中葡兩國政府和人民在交往中摸索出來的這種文化自覺，使得澳門內部社會的歷史演變沒有太多的高低起伏，沒有太多的波折苦難。在處理偶爾發生的危機時，各方也基本上沒有擺出以我為主、唯我獨尊的姿態，能夠不拘小節，不將小事化大，不搞“茶杯裏的風波”，不計一時之得失，巧妙地調和不同立場、不同利益，使得矛盾、衝突或危機最終可以和平化解。澳門社會在實踐中形成的此一特殊的生存之道，蘊含了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既是中華文化在澳門傳承的結果，又為中華文化在澳門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很大的空間。

### 三

一如前述，明中葉後，中華帝國由盛入衰，歐洲人在堅船利炮的護送下抵達國門，開放澳門可能是無法中的唯一方法。這種開放顯得被動和無可奈何，是折衷之舉。此一折衷之舉，迫使澳門在中西夾縫中、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盡可能克服內部的差異和爭端，形成一個利益一致的生命共同體，自強不息。雖然澳門是一個移民社會，居民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並且以共同語言(方言)、文化、習俗為基礎自發自願地群居，以血緣、親緣、志趣凝結成規模大小不一的社群，在日常生活中休戚與共，守望相助，更好地維

護自己的傳統和利益。然而，正是這些自然形成的社團，為社會成員構建起一個對話、溝通、尊重、諒解、容忍、妥協、信任、團結和合作的協調機制，織造出一張具有很大凝聚力、向心力、歸屬感的社團網絡，並通過利益整合成為一個擁有某種共同價值、認同和目標的공동體。這樣，在發展中可以兼顧並存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在創新中又不拋離傳統，從而令整體社會運作更加規範、有序、穩定、和諧。

因為這樣，澳門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了中西並舉、古今同在、雅俗共存、多元複合的城市，養成了兼容並包、互讓互諒、敞開胸懷的文化性格，創造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會環境，形成了祥和安定、保持對話、和衷共濟、信任合作的社區生活。在澳門居民的心理結構深層，沒有非黑即白的極端，沒有你死我活的悲情。也因為這樣，澳門有了一個比較寧靜和諧的社會環境，為中華文化的仁愛禮義精神提供了發揚光大的機遇，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傳統哲學理念提供了滋生根植的土壤。

澳門彈丸之地，一度成為華夏大地災難與世界局勢動亂中的蓮花淨土，以其寬闊的胸懷、無限的包容和博大的愛心，不僅為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提供生存、交流的空間，還默默無聞地為許多有需要的人提供無私的奉獻和幫助。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接受了超過本地人口總數的難民，充份顯現出其人性關懷和人道主義的光輝。

澳門彈丸之地，也曾經為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提供活動的舞臺，孕育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成為傳統往現代過渡的有機契合點，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變革和進步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在澳門彈丸之地，中葡利益可以各有所得，華洋居民可以各自心有所歸，不丟失自我，中外文化風俗、宗教信仰可以找到一條對話交流的可行路徑，求同存異，並行發展，從而使得澳門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發揮溝通中西的橋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距離，成為東西方關係的“變壓器”。

澳門彈丸之地，雖然無法避免禮儀之爭和鴉片戰爭的發生，也切身感受到中華民族受外族欺凌的苦難，然而，放在中西關係的宏觀視野去考察，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溝通中西思想文化和經濟貿易，在一

定程度上成為了外國力量侵入中國的緩衝區，避免了更多、更大的衝擊和災難；與此同時，又成為國人觀察世界、開闊視野的一個視窗，從而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

對中華民族來說，澳門為外國人據居，絕非一件光彩的事情。然而，在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吸取慘痛歷史教訓的同時，我們應該保持平常心態，走出歷史的悲情，自尊、自信、理性地認識到澳門在中國對外開放和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瞭解澳門在中外政治與文化衝突、妥協和融合的過程以及由此鑄造出來的寬容、和諧的人文景觀和社會性質，重視澳門在東西方文明交流、溝通、相互理解、尊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充分揭示出不同文化在澳門和平共處、兼容並包、共同發展的經驗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和意義。

令人自豪和欣慰的是，澳門歷史城區最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意味著澳門人長期實踐的歷史經驗得到世人的認可，意味著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和諧社區的管理模式受到世人的注目，意味著我們“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普遍的價值。尤其值得驕傲的是，“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文化遺產，意味著中華文化兼收並蓄的開放和包容精神充滿生命力，而且此一生命力通過“一國兩制”在澳門得到了充份的發揮和體現，並在澳門找到了與外國、尤其是西方文明交流、溝通、接軌的契合點，為當今因經濟利益或者價值信仰而紛爭不斷、暴力不絕的世界，提供了一個不同群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和平共處、多元發展、共同進步的典範。這些經驗、模式、價值、典範，對我們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復興，對構建和諧社會、對中華文明在全球化大浪潮中融入國際社會與和平崛起，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